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一二一运动



— 二 — 运 动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丽富饶的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chuí）。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断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云南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后方。大批工厂、机关、学校迁到昆明，使一向文化落后的昆明，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方。到1945年，昆明市共有4所大专院校，41所普通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在校学生达3万多人。其中，由北平、天津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更集中了国内外一流学者和大批优秀青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清华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南开则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它们不仅带去了北大的学术自由风气，清华的求实精神，南开的民主作风，而且还带去了“五·四”、“一二·九”的革命传统，在南迁途中，有250名学生和闻一多教授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安排，组织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经过68天，行程3300多里，从湖南长沙步行到了昆明。步行的师生沿途亲身接触各地风土民情，亲眼看到各地的民生疾苦，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实生活教育，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加深了认识，也经受了锻炼，培养了艰苦精神和互助风气。西南联大的迁入，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云集昆明，给古老的春城带来了蓬勃生气，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十分重视对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指导。联大在昆明成立不久，中共南方局就派王亚文建立了联大党组织，后又任袁永熙为支部书记。到1940年，联大共产党员发展到83人，占云南全省党员总数的1/3，是当时云南省党员人员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受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在地下党领导下，还建立了一批外国组织，如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群社、民众歌咏团等，作为党团结进步青年学生的纽带。党组织不断从中吸收新鲜血液，把够条件的进步分子吸收入党。

云南自辛亥革命后一直由地方势力控制。1927年，出身于彝族土司家庭的龙云取得了云南的统治权。龙云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实际上独掌云南的军政财经大权，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统治的重心转移到西南地区，云南成为国民党政府取得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鉴于云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加强了控制云南的活动，与龙云的矛盾日益加深和激化。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各种渠道，对龙云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1937年7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时，周恩来曾和龙云进行过面谈，朱德、叶剑英也以和龙云为云南讲武堂同学的身分对龙云做工作，鼓励他积极抗战。后来，中共南方局特派华岗、周新民等到昆明对龙云进行统战工作，并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直接联络的电台。在中共帮助下，龙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取得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加强对抗蒋介石的力量，龙云对各种进步力量在云南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同情和支持态度。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区一片白色恐怖，军统副局长、特务头子康泽专程到昆明，要求逮捕联大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龙云进行了抵制，并暗中把消息透露给地下党，使已暴露的进步学生得以安全撤离。龙云的开明立场，对昆明爱国民主

运动的开展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把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从1939年至1943年，连续发动3次反共高潮，除频繁袭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外，还在国统区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高压政策。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指示，把昆明各学较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转移到外地工作，其中西南联大疏散下去的约100人。留下的骨干也转而采取分散的、小型的、生活性的方式进行活动。因而这时期昆明的学生运动显得比较沉寂。但是，广大学生饱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生活也异常艰难，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现象是极为不满的，一有机会，就要起来反对。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很快占领香港。香港沦陷前，许多文化界名流、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无法撤出，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却垄断民用飞机，抢运私产，甚至他的几只洋狗也坐飞机飞到了重庆。这条消息在大后方报纸上披露后，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愤慨。在联大，历史系吴晗教授在课堂上感慨地说：“南宋亡国时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联大学生很快地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倒孔”运动。1942年1月6日，由联大学生发起，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一些中学学生响应，举行了3000多人参加的讨孔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大街上高喊“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号，并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孔祥熙进行制裁。这是皖南事变后昆明学生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大后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大反攻。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局部反攻。但国民党战场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出现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使西南后方直接受到日本进攻的威胁，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重新活跃起来，迅速掀起了一次新的争取民主的高潮。新高潮的起点是1944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会。

1944年初，国民党政府因恐惧“五四”精神的巨大政治影响，将青年节改到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引起进步人士的愤慨。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联大党组织决定以热烈庆祝“五四”来回敬蒋介石。5月3日晚上，联大历史学会召开“五四”纪念座谈会，邀请许多教授出席，其中有闻名大后方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和吴晗。座谈会场只能容纳300多人，许多学生就冒雨站在窗外听。会上尽管有不同观念的交锋，但要求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5月8日晚，联大中文系在图书馆前大草坪举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演讲会，参加的人达3000以上，昆明其它院校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前去参加。这两次集会表现了广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义愤，是争民主争自由的集会，被联大学生称为“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

1944年7月7日，昆明4所高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联合举行纪念“七七”的时事晚会，到会的昆明各界青年达2000人以上，会议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只谈学术”的禁令，热烈讨论当前的政治

问题，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这次集会加强了昆明各校学生之间的联系。

1944 年秋，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日军侵入贵州独山，使云南受到威胁。广大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和腐败无能更加不满，要求改革政治的情绪更加强烈。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云南支部共同发起，并得到龙云的默许，在 10 月 10 日“双十节”这天以昆明各界名义举行群众大会，由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吴晗等人发表演讲。尽管国民党省、市党部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工人参加集会，到会的学生和群众仍有 5000 多人。集会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在人群中燃放爆竹。一度引起了混乱。但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很快被群众揪出会场，阴谋未能得逞。会议最后通过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改革财经政策，减轻平民痛苦，提高士兵待遇，普遍平均分配全国军队装备与供应。会后进行了大游行。这次集会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庆、成都、贵阳等地也都纷纷举行集会。民主运动在大后方迅速展开。

12 月 25 日，是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这一天，昆明 4 所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联合发起召开昆明文化界纪念护国起义大会，参加者有护国元老、学生、文教界人士、工人、机关公务员、滇军军官、职业青年、市民等共 6000 多人。会议通过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痛斥，表达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列举大量的事实，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组织联合政府。会后，在地方当局默许下，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这次活动除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以外，还公开响应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很大震动。它说明昆明民主运动正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向前发展。

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皖南事变后因进步学生大批转移和隐蔽而被三青团夺去的昆明各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又被进步学生夺了回来。1944 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进步学生占了大多数。云大则在 1943 年就建立了由进步学生掌握的学生自治会。昆明其他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也在这一时期大量转入进步学生手中。国民党的御用青年组织三青团在学生中不得人心，日益孤立。

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迅猛发展的突出标志，是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和昆明学联的成立。隐蔽埋伏时期，进步学生的主要活动阵地是一个个小型的秘密读书会 and 社团，比较分散，互不联系。在民主运动出现高潮的形势面前，进步学生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需要有强有力的助手，以便更广泛地团结群众。这时，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出号召：把爱国青年的核心组织建立起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关怀下，1945 年 2 月，民青第一支部在联大建立，这是一个秘密的先进青年组织，其章程规定接受最先进政党（指共产党）领导，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不久，又成立了民青第二支部、第三支部。民青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民青建立后发展很快，到“一二·一”运动前夕，已有盟员 300 多人。民青的建立，使地下党有了联系广大学生的纽带，有了直接领导和掌握各种学生团体的坚强骨干，它的成员在“一二·一”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先锋和模范作用。

1945 年“五四”青年节，昆明 4 所高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纪念周，以

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得知后，惶恐不安。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云南地方当局和昆明各学校校长严加防范；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昆明各报不准登载有关纪念“五四”活动的消息；联大当局贴出布告，免费招待全校学生看戏。但这一切都未奏效，“五四”纪念周活动按计划顺利进行。5月4日，昆明市的爱国青年举行了抗战开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大游行，同一天，全体学生通过了成立昆明学生联合会的决议。5月26日，昆明学联正式成立，联大学生、中共党员齐亮当选为学联主席。这是当时国统区的第一个全市性学联组织，为昆明市学生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提供了公开合法的领导条件。

以学生为主体的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进步教授的大力支持。西南联大的教授多是国内外知名的一流专家学者，社会地位很高。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曾昭抡教授的鞋子常常前后见天，吴大猷(yóu)教授上课穿着打着大补丁的裤子，华罗庚教授住在牛棚里，闻一多教授到中学兼课仍不能维持生活，只好对外挂牌刻图章，吴晗教授为给夫人治病，不得不忍痛贱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连联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要做米糕送到商店寄售以补贴家用。大多数教授生活窘困，贫病交加。因而，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贪污腐败表示强烈不满，同情并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有的甚至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如闻一多、吴晗等人。1943年5月，在中共帮助下，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在昆明成立，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潘大逵等著名教授都参加了民盟。由于这些教授的特殊身分，他们在社会上、在学生中都有较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学校当局和地方当局对他们也比较尊重。进步教授们起到了学生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

昆明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力量，在云南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积蓄，特别是经过1944年至1945年间的迅猛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支排头兵、生力军。昆明，特别是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爱国民主力量日益壮大，使蒋介石如坐针毡。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更使蒋介石难以容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放手推行独裁内战政策，巩固后方，决心除掉龙云这个心腹之患，并进而扑灭昆明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借受降之机，精心设下调虎离山、釜底抽薪之计。他假装好意，让龙云的滇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不知是计，果然派卢汉率滇军主力赴越受降。蒋介石趁机派自己的嫡系部队控制了昆明，并在滇越边境布置优势兵力，对卢汉进行监视。部署完毕后，蒋介石仍不放心，亲自坐镇西昌，遥控指挥解决龙云的行动。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宪兵十三团和机场守备部队，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强迫龙云离开云南，结束了龙云对云南长达18年之久的统治。

蒋介石在解决龙云以后，任命另一位滇系将领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将杜聿明调离云南，由其另一位心腹大将关麟征担任云南警备总司令，以平息众怒，笼络人心。实际上，这只是个幌子。因卢汉当时在越南受降未归，蒋介石便让国民党党棍，CC骨干李宗黄代理省主席。李宗黄虽是云南人，但在云南名声很臭，因为1927年他曾被蒋介石派到云南“清党”，滥杀无辜，被云南人民赶走。他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蒋介石

派他回云南前，曾5次召见他，面授机宜，要求他务必消灭云南的所谓“三害”（指民主堡垒、学生运动和地方军政系统）。显然，蒋介石派李宗黄、关麟征到云南，并委以重任，是想利用这些忠实的鹰犬直接控制云南，扑灭民主运动的熊熊烈火。

李宗黄、关麟征一到云南，便和邱清泉等人狼狈为奸，对云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自恃掌握了云南党、政、军大权，又有蒋介石撑腰，决心对云南的爱国民主力量开刀；而已经发展壮大、拥有了雄厚群众基础的民主力量也决不甘屈服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样，反动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空前地尖锐和激化了，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短兵相接的较量不可避免地将要展开了。

二、枪炮声中的反内战集会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无不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从此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避艰险，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不懈努力，迫使国民政府同意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并公布于众。

但是，写着“坚决避免内战”的《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二天，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各战区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与此同时，大量印发10年内战时期蒋介石亲自拟订的《剿匪手本》，用飞机运到前线的国民党军人手里。11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剿共第一”的基本方针，制定了6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的军事计划。于是，国民党军队在日伪军配合下大举出动，扑向解放区。到11月，蒋介石共调动了13个战区的56个军，加上日伪军，总共200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饱尝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又重新陷入了内战的血海之中。

内战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人民，给人民带来了忧虑、恐惧和愤慨。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在《时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8年抗战，人民的汗流干了，血流尽了，钱被榨完了，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村破产，都市萧条，粮食缺乏，交通困难，饥荒遍地，盗匪横行，物价高涨，教育停顿，国家已到了危险的关头，休养生息尚且来不及，怎么能再来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破坏？人民群众从心底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青年，在国家 and 民族的前途再次遭到厄运的时刻，又一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堡垒——昆明的学生们，首先挺身而出。

内战的狼烟刚刚燃起，西南联大的师生已经闻到了这股烟味。9月3日，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签字，联大举行“从胜利到和平”联欢晚会，围绕反内战主题，表演文娱节目。会上，闻一多教授发表演说，大声警告国民党好战分子：人民不要内战，人民不要独裁；人民要民主，要和平；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11月1日是联大在昆明最后一次校庆纪念日。当天的进步壁报几乎都出了反内战的专刊。《学与作》壁报上写道：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制止内战，遏止反人民的逆流。《生活》壁报上写道：反对内战，人民流血换

来的胜利不是用来哺养内战的！联大民主墙上贴满了各种反对内战的文章。

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11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并号召各地建立类似组织，然后成立全国反内战联合会，动员全国同胞参加，以制止内战。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

在昆明，中共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和许多进步学生看了《新华日报》和听了延安广播后，反映强烈。中共云南省工委认为，应以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号召。11月22日，省工委负责人同西南联大党组织研究后，决定通过党员和民青做工作，由4所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一次反内战时事晚会，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接着，联大、云大、中法、英专4校学生自治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25日晚在云大至公堂联合召开时事晚会。昆明的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

李宗黄等人得知学生将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的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集会。11月24日晚，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召开党政军紧急治安联席会议，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25日，报纸上公布了这个禁令。这天上午，李宗黄还召集昆明各大学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务必制止学生集会。联大和云大负责人当场委婉说明，过去常有这样的集会，从未发生事端。但李宗黄等人一意孤行，根本不听劝告。李宗黄向云大校长熊庆来施加压力，不许把学校礼堂借给学生开会。迫于李宗黄的压力，云大当局贴出通告说，学校礼堂（至公堂）暂停使用。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中共地下党通过民青建议把晚会地点改在联大草坪，被学生们接受。开会前，联大当局接到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禁止这次集会的公文，但联大当局认为校内集会属于正常，没有加以干涉。

11月25日晚7时左右，在冲破了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后，反内战时事晚会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如期举行。参加集会的有各校师生、青年职工、社会人士共6000多人。周新民、尚钺(yuè)、吴晗、闻一多等教授出席了晚会。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第一个发表演讲，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应有的认识》。钱先生以国民党员和参政员的身分，极力强调当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

钱先生演讲还没有完，联大新校舍东边围墙外突然响起了机关枪、步枪和小钢炮声，紧接着西边围墙外也响起了枪声。由于事起突然，会场上一度出现混乱。但是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军警故意骚扰破坏，因而会场很快恢复了平静。

第二个演讲者是联大经济系教授伍启元，题目是《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就必须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

在伍先生演说时，墙外手枪、机关枪、手榴弹声再次响起，但他丝毫不为所动，照常演讲，而听众也处之泰然，没有出现惊慌。

国民党特务看到鸣枪、放炮不能阻止晚会继续进行，又使出了新的花招。8时20分左右，特务切断了电源，会场顿时一片漆黑。但晚会组织者早有准备，立即点亮事先准备好的汽灯，晚会继续进行。

第三位演讲者是费孝通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内战与美国》。费先生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的嫌疑，但是，责任不在美国人民，而在美国的财阀和军阀，他呼吁中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制止中国内战。费先生演讲途中，反动军警不断向会场上空射击，流弹呼啸着从人们头上飞过。费先生被反动派的卑劣行径激怒了，他激昂地表示：“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费先生的话引起全场的强烈共鸣，大家高声齐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并对费先生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晚会的气氛进入高潮。

费先生演讲结束后，联大、云大 12 个学生团体的代表向大会宣读建议书，要求大会通过反对内战宣言，被大会鼓掌通过。

这时，一个自称是“老百姓”、姓“王”的中年男子，强行要求上台发言。大会主持人劝阻无效，只好临时改变会议程序，让他先讲。他一上台就声嘶力竭地叫嚷：“中国的内战，不是内战，是内乱！……”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愤怒的群众打断了。几千人异口同声地喊道：“把他轰下台，撵出会场去！”这人一见形势不妙，不敢再讲下去，连滚带跳地窜下台去。这时，大会主持人根据群众揭发，当众揭穿这个自称是“王老百姓”者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

原来，时事晚会召开前，查宗藩奉命率领一批特务潜入会场进行破坏活动。出发前，关麟征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云南警备总司令的身分指示他们，如果任务不能完成，就应自杀以谢党国。但是，由于学生们把会场布置得很严密，群众情绪热烈，特务们不敢轻举妄动。查宗藩害怕回去交不了帐，只好硬着头皮上台，没想到一上台就露出原形。从此，“王老百姓”在昆明人民口中成了国民党特务的代名词。

晚会最后一位演讲人是云大潘大逵教授，讲题是《如何制止内战》。潘先生是民盟盟员，他在讲演中极力强调，尽快召开政治会议，建立联合政府，撤退在华外国军队，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

潘先生的讲演结束时，已经将近晚上 9 点钟了。墙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坐在主席台上的教授们担心学生的安全，建议提前结束大会，被大会主持人接受。学生们唱着《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排队离开会场。

不料，学生们走出联大校门后，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联大对面的城墙缺口，大西门等处架设机关枪，封锁了道路。几千人在寒风中静坐到深夜，才抄小路进城回家。

学生在校园内举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并以开枪开炮的手段相威胁，这是对于人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最粗暴的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许多学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立即自发地酝酿罢课。11 月 26 日早晨，昆明国民党《中央日报》以《西郊匪警，黑夜枪声》为题刊登了一条歪曲事实的消息：

[中央社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 7 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学生们看到这条消息，愤怒的情绪顿时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西门外”正是昨晚开会的西南联大，“7 时许”正是昨晚开会的时间，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正当的集会，竟被诬蔑为“匪警”，几千名学生被诬蔑为“匪徒”，真是岂有此理！总罢课很快地成为学生们的一致要求。这条消息是国民党云南

警备总司令部编造的，关麟征亲自过目，并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送到通讯社，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威胁，没想到反而成为昆明学生总罢课的导火线。

中共云南省工委在听取民青负责人汇报后，认为学生要求罢课是完全合理的、正义的，应该坚决支持，决定发动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26日晨，联大物理系学生不等学生自治会作出罢课决定，就把学校作上课号令用的半截钢轨藏了起来，使学校敲不成上课钟，学生们自发地开始了罢课。26日下午，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罢课3天，并组织罢课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云大、中法、英专和一些中学也相继建立类似组织，开始罢课。从这天起，参加罢课的学校逐日增加：26日有18所，27日有27所，28日达31所，29日增加到34所，到12月1日发生惨案后，全市大中学校全都罢了课。

11月27日，昆明市学联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决定全市3万大中学生实行总罢课，并成立“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作为公开领导机构，办公处设在联大。罢联和多数学校罢委会的领导骨干都是中共党员和民青盟员。28日，经中共地下党提议，罢联发表了经全体大中学生讨论通过的《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由地下印刷厂制成数以万计的传单，广泛散发，传播到全国各地以至海外。宣言阐述了昆明爱国学生对国是的主张，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武装干涉集会的卑劣行径，提出了复课的具体条件，是罢课期间的斗争纲领，在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以及国统区一些同情昆明爱国学生的报刊都曾转载。

罢课后，各校的进步社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拥护罢课，反对内战、独裁为内容的活动。学生们发宣言，散传单，贴标语，出壁报，开展歌咏活动，组织街头演出，向社会各界说明时事晚会真相，控诉国民党当局无理干涉学生集会自由的暴行，把反内战的民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昆明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1月2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发表抗议书，对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使军队干涉学生集会的非法举动表示最严重的抗议。30日，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表声明，指出地方当局颁发禁止集会和游行的命令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以武装干涉学生在校园里的集会“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未有的武器用途的记录，也造成了中华民国以来军阀压迫学生的新花样”，表示完全同情并声援学生的罢课行动。许多群众以写慰问信和捐款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罢课。昆明市的一些警察也同情学生，有一次，3名联大学生在街上被宪兵抓走，昆明市警察局一位负责人立即将消息通知学生方面，让他们及时设法营救。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民主运动，云南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决定进一步采取高压政策。11月27日，李宗黄等召集各校负责人和宪警方面举行紧急会议，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采取“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办法，对付学生。并宣布4项紧急措施：（1）命令各校当局克日交出平日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2）限各校28日复课；（3）在各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4）自即日起，暂时禁止各校学生往来。关麟征则公开扬言：学生有在校内开会的自由，我也有在校外开枪的自由。暗示将继续用武力对付学生。

罢课学生与国民党当局破坏罢课的企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以宣传对宣传”的方法，大造诬蔑中国共产党、污

蔑学生罢课的舆论，把学生反内战的正义举动说成是受共产党利用，甚至威胁“反对内战的就是共产党”。针对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罢联出版《罢委会通讯》，向人民群众说明事情的真相，宣传反内战、争民主，和平统一的思想，给反动派以有力地回击。《罢委会通讯》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每期印数达1.5万份以上。

国民党反动派的另一伎俩是“以组织对组织”，就是通过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爱国学生的“罢课委员会”相对抗，破坏学生罢课。但是，没有学生愿意参加这样的组织。反动派就让各校校长出面，逼迫学生参加。但是，会一开完，被迫而来的学生纷纷溜之大吉。于是，“反罢课委员会”也就烟消云散了。

国民党反动派使用的第三种方法，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采取威胁、毒打、逮捕等手段破坏学生罢课。他们甚至计划，只要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就组织特务和地痞流氓进行反游行，趁机寻衅闹事，以便为出动军队镇压学生制造口实。由于中共地下党事先得到情报，没有组织游行示威，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但是，利令智昏的云南国民党当局并不善罢甘休，在破坏学生罢课的阴谋连遭失败后，决定对广大爱国学生进行更加残暴的镇压。一场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终于在昆明发生了。

三、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昆明“一二·一”惨案，是云南省国民党当局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有预谋、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镇压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国民党当局的既定方针。学生罢课后，国民党当局发现高压措施和特务破坏都不能达到阻止罢课的目的，决心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对付爱国学生。

从11月28日起，国民党当局派大批军人、宪兵、特务到参加罢课的中学，强迫学生复课。与此同时，上街宣传的学生不断受到宪兵、特务的殴打和非法逮捕。11月29日晚，李宗黄、关麟征等召集会议，进一步策划用武力对付学生。李宗黄声称，必要时不惜流血。关麟征则表示，一切由我负责，而我只对蒋委员长负责。在他们的鼓动下，这次会议决定：凡是打伤学生者，都可以立功请赏。国民党当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和镇压大大升级。

11月30日，昆明发生多起严重流血事件。在武成路，10多个特务围住学生宣传队，打伤队员田振邦、杨文浒。在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前，特务用刺刀刺伤了张天珉同学的手臂，开枪打伤了何泽庆同学。特务们还闯进云大、中法大学、联大师范学院，捣毁桌椅，撕毁壁报，破坏门窗，并在联大师范学院打伤学生张崇安和吴锡光。还有一批特务捣毁了《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就此满足，他们正准备采取更大的行动。11月30日这天，张濯（zhuó）域（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查宗藩、高云裳（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杨灿（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科长）、周绅（三青团云南支部部秘书兼宣传股长）等开会商议，决定由查宗藩，杨灿纠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20人，由高云裳、周绅纠集三青团50人，由张濯域调派第五军政治部便衣队和军政部军官总队队员协同参加，第二天去屠杀学生。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用几辆美国卡车满载碎石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和云大外面的公路上，作为行凶的武器。周绅还带领特务在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演习投掷手榴

弹。一场针对爱国学生的大阴谋即将出场。

中共地下党对反动派的阴谋有所察觉，通过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并决定暂停上街宣传，要求同学不要单独外出。

12月1日上午，李宗黄在出席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就职典礼后，立即赶到国民党省党部，向等在那里的特务们训话，作屠杀前的最后动员。要求特务们以流血对流血，效忠党国。于是，由国民党省市党部、三青团省市团部、云南警备司令部便衣队、军官总队部分学员，第五军688团部分军人和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组成的队伍，分头出发，进攻各学校。

李宗黄在省党部亲自布置镇压学生，被省党部同情学生的一位会计听到后，立即转告他的朋友云大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立即报告云大，并通知联大采取紧急防卫措施。

上午10点钟左右，查宗藩带领80多名暴徒，手持铁条木棒，冲进云南大学，撕毁反内战标语，捣毁校警岗棚，砸坏桌椅和捐款箱，并追打学生。云大校门内有90多级的高台阶，学生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奋力抵抗。暴徒叫嚣冲击，终因台阶太高太陡，攻不上去，只好呼啸而去。

上午11点多钟，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100多人，由一名军官带领，携带铁木棍棒，向联大新校舍走来，后面跟着另一群穿黄军服的暴徒。到达校门口，带队军官声称要进去看壁报，为学生婉言谢绝。正在争执中，10几个暴徒突然拿出木棍、铁条、石块等殴打学生和校警。学生们奋起还击，将闯进校内的暴徒赶了出去，迅速地关上大门，并用黑板、课桌等堵上。暴徒们疯狂地向校内投掷石块砖瓦，并用铁锤、锄头、扁担等攻击大门。学生们在校内奋力抵抗，并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但疯狂的暴徒们根本听不进去。黄其道同学爬上围墙边的梯子，准备同外边交涉一下，被石块击中头部，摔了下来。由于学校大门是木制的，终于被冲开一个大洞，暴徒们一涌而入，用石块棍棒追打学生，学生拼命还击。在搏斗中，许多人受了伤，流了血。纠察队员罗纪行被石块打伤脑袋后昏倒在地，刘杰同学臀部、腿部受伤后流血不止，当场受伤的还有魏立中、张君平、向大甘、陈琪、吴达志等同学。在学生们齐心协力反击下，闯进学校的暴徒终于又被赶了出去，其中一名暴徒被学生当场抓获。这人叫崔俊杰，胸章符号为述字第1025号，供认自己是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奉上司之命来联大攻打学生。赶走暴徒后，学生们迅速关上大门，并堵住缺口，防止暴徒再次闯入。

当暴徒正在猛攻新校舍大门的时候，在南区实验室工作的袁复礼教授闻讯前来劝阻，遭到了暴徒的野蛮殴辱，见状前来劝解的李德宁和马振仪两位学生，也被打伤。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张人鹤路过这里，见军人蛮横无理，仗义劝告，竟遭到暴徒们的围攻。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竟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准备投向联大校园内，于再看见后，奋不顾身向前阻止，不幸被手榴弹炸成重伤，当晚10时许不治而逝。于再受伤后，暴徒们继续冲击联大校门，终因学生防守严密，未能得逞，只好悻悻地撤走。

在暴徒攻打联大新校舍的同时，周绅率领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和第五军便衣队共50多人闯入钱局街联大附中行凶。幸而当天是星期六，学生大都离校。暴徒们捣毁门窗、抢走捐款箱内的钱后仍不甘心，又冲向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师院学生得知云大和联大新校舍被暴徒围攻的消息后，已有所准备，紧闭大门防守。但因师院校门是木门，经不住众多暴徒的冲击，暴徒们没费多大力气就破门而入，撕毁壁报，破坏布告栏，用石头、木棍追打无辜的学

生。学生们被迫后退，一面还击，一面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最后推开饭厅窗子，退入隔壁的昆华工校。暴徒们冲进饭厅后，大肆捣毁餐桌餐具，一名暴徒将一枚手榴弹扔到饭厅前院中，幸未伤人。接着，几名暴徒又爬上女生宿舍楼梯，企图行凶，被女同学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子和石灰迎击，没有得逞。这时，师院学生在昆工同学的大力支援下发起反击，用石子猛烈驱赶暴徒，终于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大门。但是，丧心病狂的暴徒们又将大门打破，并扔进两枚手榴弹。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许多学生受伤倒下。一群暴徒乘机再次冲进门内，用棍棒、石头、钢钎殴打受伤学生。已经受了重伤的师院女生潘琰(y n)遭到暴徒的围攻，凶恶的特务龚政德(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人事室二级助理干事)用2尺多长的铁条猛力刺入她的腹部，连刺3下。当同学们赶来救护时，潘琰已经呼吸微弱，但还勉力呼喊：同学们，团结啊！终因伤势过重于当日下午去世。与潘琰同时遇害的还有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昆工学生张华昌。联大师范学院、共产党员缪祥烈，与特务英勇搏斗，被手榴弹炸断左腿，成了终身残废。受伤的还有师院学生李复业、牛兆恒，昆工学生李云等人。特务们行凶后，高呼“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扬长而去。在爱国学生的鲜血染红的师院校园内，女学生们在掩面哭泣，男学生们满腔怒火。校门外的市民们，目睹了暴徒的兽行后，也愤愤不平地感叹：这是什么世界！

暴徒们退走后，学生们立即把重伤员送往云大医院抢救。护送重伤员的学生返校时，在路上又遭到一队士兵的毒打，手表、钢笔和学生证全被抢走。联大师范学院学生高金堂被打成重伤，云大医院女护士马静成上前劝阻，也被打伤。

下午2点钟，六七十名暴徒在一穿西服者的指挥下，攻打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他们先打学生宿舍，由于学生防守严密，未能冲入，就改而攻打迤(yí)西会馆。这里是教职员宿舍和教室区，暴徒将校警和传达室职员打伤后，就冲了进去，一路上把学校布告栏和教室玻璃窗打碎。当时是星期六下午，院里没有学生。马大猷教授听到动静后，出来相劝，一名暴徒大骂“你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土匪！”对他拳打脚踢，棍棒齐下，致使他的背部、手上多处受伤。钱钟韩教授也被二名暴徒围住殴打，这时教员牟光信拿着电阻表从实验室出来，暴徒说他拿的是无线电发报机，并硬说他是共产党宣传员，于是不容分说，就是一顿毒打，然后把他抓到领队面前报功。领队看到确实不是发报机，才把他放走。暴徒撤走时，还抢走了校警的两支步枪。

同一天，暴徒再次捣毁《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并抢走全部现款。

总计在12月1日这一天，国民党暴徒分头攻击了云南大学、联大师范学院、联大新校舍、联大附中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等处，并骚扰了昆华女中和南英中学，打死打伤师生数十人，其中轻伤30余人，重伤25人，于再等4人惨遭杀害，成为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

于再，原名于镇华，浙江杭州人，1921年生。1938年2月到达延安，进陕北公学第三期学习，结业后被派回国统区工作，曾参加保卫武汉的战役。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被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任徐冰的临时交通员。1943年，于再为实现直接参加抗战的愿望，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中尉军需官。1945年6月，于再随远征军回国到昆明。这期间，他虽然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由于生活所迫，于再应聘到私立南菁中学任出纳兼地理教员。12月1日上午，于再

路过西南联大新校舍门口，目睹国民党军人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义愤填膺（yǐng），挺身而出，被暴徒扔出的手榴弹炸伤，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入党的誓言：活着干革命，死为党献身，马列真理代代传，血染红旗万象新。

潘琰，江苏徐州人，1915年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母亲是二房姨太太，在家中没有地位，潘琰从小过着奴隶般的生活。17岁那年，潘琰终于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进入徐州立达中学读书，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抗战爆发后，潘琰投笔从戎，先是参加医院救护工作，后参加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1939年，该团被蒋介石解散，潘琰考入湖北建始女子师范，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宣传委员。1940年，由于形势恶劣，潘琰经党组织安排疏散，从此和组织失去联系，但她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1944年秋，潘琰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她一面学习，一面投入如火如荼（tú）的爱国民主运动，主动配合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青开展工作。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暴徒进攻联大师范院，潘琰带头冲在前面，把暴徒赶出校外，不幸被手榴弹炸成重伤，已经倒在血泊中的潘琰看到同学李鲁连伤重倒地，不顾自己的伤痛奋力前去救护，竟被丧心病狂的特务用尖头铁条在她腹部连刺3下，终因伤势过重而壮烈牺牲。她是为民主运动捐躯的4烈士中唯一的女性。

李鲁连，原籍浙江嵊（shèng）县，1927年生于山东青岛。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门任职，服务地点常有调动。他从小跟着父亲东奔西走，几乎跑遍了大后方所有省份，前后读过7个中学，但他很用功，成绩很好。1945年，李鲁连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数理化专修科。他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对国民党也并无恶感。然而，当他目睹11月25日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军队武装干涉后，开始觉醒过来，对同学说：“国民党如此手段，可谓到了末路。”从此，他积极投入反内战运动。12月1日中午，国民党暴徒进攻联大师范院，学生们奋起抵抗，李鲁连站在斗争的前列，被手榴弹炸中要害，成为民主运动捐躯的第一位烈士，牺牲时年仅18岁。

张华昌，云南曲靖人，1929年生，是4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初中毕业后以荀极中的名字考入省立昆华工业职业学校。他体格健壮，文笔出众，待人热情，见义勇为，很受同学们喜爱。1945年12月1日，当联大师范院同学遭到国民党特务袭击时，昆华工校几十名同学前去援助。张华昌冲在最前面，手持一根大木棍和正在行凶的暴徒英勇搏斗，不幸被手榴弹炸中头部，牺牲时年仅16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曾一再表示要实施宪政，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而在号称“民主堡垒”的昆明，当局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派遣大批军人特务，攻打神圣的高等学府，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这是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比192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更为凶残。因为“三·一八”惨案是学生在街头游行时，才遭受军警的摧残；而这次却是国民党当局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派遣武装暴徒攻打学校，在校园内制造流血惨案。闻一多教授悲愤地指出：鲁迅先生说“三·一八”是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34年12月1日。在为4烈士撰写的碑文（手稿）中，闻一多教授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四、四个人倒下去，四万万人站起来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疯狂的屠杀把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下去，然而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反动派的屠刀不仅没有吓倒昆明的爱国学生，反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四个人倒下去，四万万人起来了！以“一二·一”惨案为契机，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悲愤填膺，热血沸腾，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在联大新校舍，担任校园保卫工作的张友仁等7名同学写下绝命书，并在宿舍南边柏树丛前留影纪念，表明牺牲决心。在联大工学院，全院学生在晚饭时向死难同学默哀3分钟，许多学生踊跃向受伤同学献血。昆华、惠滇两所护士学校的学生主动到联大救护伤员。云大附中学生全部搬进云大，参加斗争。一些原来对罢课不积极的学生也积极起来了，未参加罢委会工作的人也自动参加了。联大外语系一位女生，平时洁身自好，不过问政治，她的理想是大学毕业后去外国留学，将来建立一个西方18世纪“文化沙龙”式的家庭，自己做一个高雅、受人崇拜的“文化沙龙”的主妇。在惨案发生的下午，她对同学说：我不能再旁观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不是生在18世纪。于是她立即自动地参加救护工作，当天晚上在救护室里守了一个通宵。各学校内的国民党特务陷入空前孤立，被迫停止活动。全市学生罢课浪潮更加高涨，反对罢课的言论消声匿迹。

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依靠多年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以党员和民青盟员为骨干，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力军的战斗队伍，争取各方支援，利用国民党当局内部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大举反攻，目标对准以李宗黄为首的反动派。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昆明学生开展了万人公祭、停灵复课、出殡公葬等几次大规模的斗争。

12月2日下午，学生们在联大图书馆前隆重地举行4烈士入殓(liàn)典礼。各校师生、工人、农民、各界人士共6000多人前来参加，联大代常委叶企荪任主祭人。当人们看到烈士遗体那种血肉模糊的惨状时，无不失声痛哭，有的女学生竟当场晕倒，主祭人也泣不成声，无法致词。大家在烈士灵前宣誓：我们不仅是哀悼，我们誓死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到底，我们要复仇，为千千万万无辜的被法西斯匪徒残害的人们复仇！我们将踏着死者的血迹前进，绝不后退一步！

从这天起，在1个半月里，从早到晚，前往设在联大图书馆内的灵堂，祭奠烈士的人群络绎不绝。大中小学校师生、民主人士、学术团体、工人、农民、市民、工商职员、下级军官及士兵，兄弟民族和宗教界，携带祭品，结伴同往。仅12月6日一天，公祭团体就有省参议会、民盟云南支部、中苏文协昆明分会等57个单位。参加祭奠的人累计达15万，而当时昆明全市仅30万人口。各界人士纷纷解囊捐款，总数达3000万元法币。人们还写了许多挽联、悼诗，表达对4烈士的崇敬，对反动派的愤恨，对民主运动的胜利信念。下面摘抄数例：

要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结果；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

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专政魔鬼，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

这两副挽联，都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写的。半年以后，他也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为民主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挽联是：

牺牲生命，牺牲头颅，争和平民主，壮哉死矣！
屠杀青年，屠杀人民，问民主宪政，果如是乎？

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挽联表达了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和赞扬：

争取和平自由，洒尽热血，凛凛浩气传千古；
肃清豺狼鬼蜮，完成遗志，屹(k)屹丹心在吾人。

学生们的挽联和悼诗表达了继承先烈遗志，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
明天我们就倾覆法西巢穴。

联大学生自治会挽

反内战，反独裁，先烈已成仁，英灵不昧，莫饶刽子手；
争自由，争民主，后死更有责，黑暗未除，誓拼男儿头。

云南大学全体同学挽

肩负起历史的任务，为反对内战，为争取自由，洒出了你们的鲜血；
担当着未完的使命，为根绝独裁，为实现民主，永步着你们的后尘。

英专 1947 级全体同学挽

请看中法大学罢委会的《祭诗》：

同志，
你们用血，
你们用肉，
向世界宣传，
向世界控诉：
中国没有自由，
中国没有幸福。

同志，
你们用血，
你们用肉，
向世界宣传，
向世界控诉：
中国有法西斯的细菌，
中国有希特勒的匪徒。

同志，
你们用血，
你们用肉，
向全世界宣传，
向全世界控诉：
你们死，为反对内战，
你们死，为争取民主。

同志，
安息吧！
我们没有哭泣，

我们没有妥协，
只有踏着你们的血迹，
战斗到底。

千千万万人在灵堂里受到了教育，深化了思想，明辨了方向，更加坚定了反内战争民主斗争的决心和信念。公祭活动在“一二·一”运动中，起了教育人民、揭露敌人的重大作用。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在一片谴责和声讨声中，统治集团开始内讧（hòng），关麟征和李宗黄之间发生争吵，关对李说：我不当屠夫，屠夫留给你去当。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和警备总部特务狗咬狗，互相埋怨，甚至在大街上争吵和打架。国民党和三青团也互相推诿（W i）。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当局被迫采取暂时退却的策略。

12月1日下午和2日上午，关麟征两次到联大，假惺惺地对受害学生表示“道歉”和“慰问”，并保证捉拿“凶手”归案。紧接着，李宗黄、关麟征等人自导自演了一场假“公审”、假“惩凶”的丑剧。他们找到两个无业流氓陈奇达、刘友治做替死鬼，说这两人是向联大师范学院投掷手榴弹的凶犯，在“审讯”中，这两人又供认受“共党分子姜凯”指使，但不仅说不出“姜凯”的年龄、籍贯、住址，连相貌特征也说不出来。因此，尽管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姜凯”，云南警备司令部也只好顶住不办。罢联和联大教授会发表声明，反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审判，指出惨案的主谋实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国民党当局的欺骗阴谋未能得逞。

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宣布各中学提前放寒假，通知学生家长把子女领回家，妄图釜底抽薪、分化瓦解学生队伍。在罢联领导下，中学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许多学生坚持留校，一部分学生迁入联大和云大居住，另一部分回乡的学生则带着反内战运动的材料，在各地发动群众，声援昆明学生。国民党当局以提前放假来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再次破产。

蒋介石深恐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持续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危及自己的独裁统治，不得不亲自出马，于12月7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他一方面表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另一方面无理指责学生罢课“贻误建国前途”，要求学生们即日复课。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利用蒋介石的权威，学生们就会乖乖地听话复课，没想到学生们根本不把蒋介石的文告放在眼里。罢联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驳斥蒋介石文告中的谬论，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惩办制造惨案的元凶李宗黄、关麟征。这说明，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制造镇压爱国学生的血腥惨案，他们的威信已经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

蒋介石为了尽快平息学潮，不得不将关麟征“停职议处”，请卢汉出马，并派联大常委、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到昆明会同卢汉平息学潮。卢汉是仅次于龙云的云南第二号地方实力派人物，与蒋介石嫡系有一定矛盾，对罢课学生表示了一定同情，也愿意答应学生提出的一部分复课条件。但他对学生提出的惩办李、关、邱等元凶的要求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要求学生即日复课。傅斯年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他到昆明后，对罢课学生软硬兼施，一方面在学生面前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另一方面操纵联大教授会通过决议，劝告学生限期复课。被学生拒绝后，他又企图采取校长和全体教授辞职的办法，压迫学生复课。蒋介石在采取软化策

略的同时，也准备一旦软的一手不行，就采取“最后处置”的办法。这就是解散联大，让北大、清华、南开提前复员，云大提前放假，把坚持罢课的学生交给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处理。

昆明学生总罢课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逼出来的。面对枪炮的恫（dòng）吓威胁和手榴弹刺刀的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除了罢课以外，别无它法。经过20多天的尖锐斗争，提高了广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扩大了进步力量，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反内战、争民主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是通过一次运动就能够完成的。罢课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有适可而止，才能保护广大学生的斗争积极性，才能团结广大教师和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中立。当时学生不同意复课的主要原因是惩凶要求未得到满足。要求惩凶无疑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但如果一定要先惩凶再复课，罢课势必会无限期拖延下去，从而脱离广大中间群众，暴露运动骨干，甚至可能导致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挥舞起屠刀。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1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郑伯克和在《云南日报》工作的欧根、在民盟工作的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商量后，决定接受周新民的建议，采取停灵复课的办法。所谓停灵复课，就是在一定条件获得解决后，先复课，但暂不出殡，等其它条件解决后再出殡。这是老百姓打官司的办法，被仇家打死了人，把棺材停在屋里，官司不赢不出丧。停灵复课是斗争策略的一次重大转变，既非常适时，又完全正确。经地下党做工作，12月1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通过修改复课条件的决议。12月20日，罢联召开各校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后的5项复课条件：（1）保障人身自由，不因此次事件而开除学生，解聘教师；（2）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3）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消息言论；（4）政府负责死伤善后费用及赔偿公私损失；（5）查办杀人主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

这时，联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在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下，正准备辞职。中共地下党通过闻一多教授对梅贻琦做工作，向他说明学生顾全大局，珍视联大前途，只要满足适当的条件，学生是会复课的。经过这次谈话，梅贻琦表示支持学生的要求，并积极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云大校长熊庆来发表辞职电报后，云大罢委会负责人侯澄、李继昌专程拜访他，表示学生已决定停灵复课，学生爱戴熊校长，希望他不要辞职，并且告诉他，云大教授中的国民党党棍正在活动校长位置，请他不要中奸人之计。熊庆来深受感动，立即收回了辞职电报。这样，学生就把地位非常重要的两位校长争取到自己一边。

在联大、云大等学校当局和大多数教授、教师支持下，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到12月24日，学生的复课条件基本上得到满足。除国民党当局原已答应的第（1）、（2）、（4）项条件外，关于第（3）项，由梅贻琦、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说明“一二·一”惨案的真相，昆明《中央日报》全文登载。由于梅、熊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的声明一经登出，一切谣言便不攻自破。关于第（5）项，国民党当局虽然不可能真正惩凶，但不得不把李宗黄调离云南，这同样是学生斗争的结果。至此，“一二·一”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12月27日，昆明学生宣告复课。

为了扩大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影响，昆明市学联决定在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出殡。国民党当局得知后，手忙脚乱，百般阻挠。中共地下党

为了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决定在坚持按期出殡，以扩大宣传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同意在出殡过程中，不喊口号，不贴标语。

出殡这天，昆明各校师生以及工人、农民、店员、军人、士绅和宗教界人士等共3万多人参加了送葬队伍。上午11点半队伍开始出发。队伍的最前面是写着“一二·一惨案殉难烈士殡仪”的大横幅，接着是自由钟，后面是殡仪主席团和写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大字的12块大木牌标语，失去一条腿的缪祥烈同学引人注目地坐在人力车上。后面是4个送殡大队，队前分别写着潘琰、李鲁连、于再、张华昌烈士殡仪的横幅和像亭，后面是灵车和送葬队伍。出殡路线经过昆明各主要街道，在各重要路口及烈士殉难处都设有路祭台，队伍经过这里时，都要宣读祭文。虽然国民党当局限制喊口号，贴标语，学生却高举着挽联、标语牌，向反动派发出无声的抗议。

这一天，昆明市万人空巷，倾城而出，出殡路线两旁人山人海，阳台窗口，都挤满了人群。出殡前，地方当局通令关闭店户，企图以此削弱出殡的影响。没想到弄巧成拙，使全市男女老小都有机会看到这一悲壮盛典。当群众看到烈士的灵柩(jiù)和血衣时，无不义愤填膺。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反动派欠下的这笔血债。

下午5点钟，出殡队伍回到联大新校舍，举行公葬典礼，4烈士被安葬在联大新校舍东北角。3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我们将以更坚定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niè)痛击！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二·一”惨案，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屠杀手无寸铁的昆明学生的暴行表示无比愤慨，对坚持斗争的昆明学生则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援。国民党统治区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声援昆明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特点的反内战运动的高潮。

在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教师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并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以各种形式声援学生。云南大学71位教职员联名发表告各界书，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赞助，要求国民党政府对事件作合理的解决。中法大学全体教授表示支持学生罢课到底。西南联大教授会决定停课一周，表示抗议；发表公开声明，说明惨案真相，指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是惨案的主使人，并组织法律委员会，搜集了大量证据，写成《起诉状》，控诉李、关、邱等人。昆明市大中学校近300人，联大讲师、助教和附中教员联合会分别发表罢教宣言，表示将罢教到学生复课日止。许多进步教授和教师如闻一多、吴晗、费孝通、张奚若、费青、向达等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说，或以行动表示对学生的支持。特别是教师以罢教的形式支持学生，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所未曾有过的，对学生是巨大的鼓舞。对此，《新华日报》社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惨案发生后，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也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灭绝人性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坚决主张彻底消灭内战，实行民主政治，立刻组织联合政府。《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7家期刊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完全赞同昆明学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运动，并出联合增刊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云南地方政界人士也同情学生的遭遇。云南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决议，请省政府立即制止暴行，保障学生安全。

昆明市工人、店员、职业青年、国民党官兵等各阶层人士，纷纷以公祭烈士、写慰问信、捐款等各种方式，热烈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捐款是

各界人士最普遍的声援办法。从普通市民到地方名流，都通过捐款表达他们对学生的支持。10多位署名“穷苦老百姓”的市民共捐款1.7万元，一群士兵捐献出他们仅有的1600元薪饷，18个学徒捐出了他们1个月的收入。联大德籍教授李华德捐款5万元，龙云夫人顾映秋捐款50万元，龙云次子龙绳祖捐款10万元。

昆明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云南各地后，云南几十个县的师生，通过派代表到昆明吊唁、开追悼会、写慰问信、募捐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一二·一”运动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办的《新华日报》，迅速、详尽地报道昆明学生英勇战斗和各地热烈声援的消息，并多次发表社论、短评和专论，及时传达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既有力地声援了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又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5年12月6日，重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由黄炎培、何公敢、郭沫若、沈钧儒、梁漱溟等领衔，致电昆明学生，誓作后盾，并电汇法币10万元作为死伤学生安葬和医药费。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妇女界，实业界，以及《中华论坛》、《再生》等26个杂志社，先后致电慰问昆明学生。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茅盾、巴金、孙起孟、曹靖华、陈白尘、邵荃麟、冯乃超、冯雪峰、叶圣陶等都发电发函慰问昆明师生。

12月9日，重庆各界人士3000人在长安寺举行“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把重庆的反内战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公祭会场设立了烈士灵堂，院子里挂满了挽联。北平留渝同学的挽联写道：

忆当初一二·九运动，为了要求抗日，我们无辜，惨被大刀水龙打，虽然事隔十年，伤痕宛在，抚今思昔不胜悲；

恨今日一二·一惨案，由于反对内战，君等何罪，竟遭机枪炸弹屠，但是名留千古，浩气长存，继往开来已尽责。

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梁漱溟、张东荪3人的挽联是：

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

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

追悼会主祭团由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张东荪、罗隆基、史良、章乃器等人组成，沈钧儒任主祭人，他说：“中国每次的政治行动，都是由学生首先领导起来的；反对内战是人民的公意，昆明师生为反对内战而英勇牺牲了，我们都要跟着他们走。”

最后，郭沫若高声朗诵了《进步赞》：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

郭沫若慷慨激昂地指出，人民也进步了，我们相信进步的人民一定会战

胜反动力量。追悼会在“反对内战”、“民主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昆明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士满怀悲愤。各校学生连夜集会，出壁报抗议，要求惩办凶手，为烈士报仇。12月9日，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的发动和组织下，四川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中大医学院等大中学校5000余师生，冲破反动派的阻挠，在华西坝召开了追悼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国际友人文幼章、夏仁德等也积极参加。接着，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桂林的广西大学和许多地区的中学，也开展了声援昆明学生的运动。

1946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为声援昆明学生爱国运动，以于再妹妹于瘦梅的名义，在玉佛寺举行于再烈士追悼会。上海各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近万人参加了公祭。宋庆龄女士送了“为民前驱”的挽幛（zhàng）。会场上挂满了各界人士送的挽联，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声讨：

这是什么天下，教授学生遭此屠杀；
竟有如此政府，凶手主犯任其法外。
为争民主洒热血，
誓教暴君见末日。

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7人组成。马叙伦代表上海文化界读祭文，并发表演说，对昆明死难师生表示哀悼。各界代表纷纷致词，朗诵挽诗。追悼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南京、武汉、西安、广州、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天津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城市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声援活动。反内战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党政军和各界群众也积极响应和声援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1945年12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1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下来了。这是对“一二·一”运动的最恰当的评价。

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华侨学生致电昆明学生，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美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昆明惨案，美国舆论界认为这是中国民主与反民主的冲突，同情昆明学生运动。还有一些美国舆论批评美国政府卷入中国内战，有几位议员要求总统把美军撤出中国。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影响超越了国界。

五、第二条战线的发轫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的反内战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烈士出殡为止，历时近4个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抗日战争才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就冒天下之大不韪（w i），把残酷的内战强加到人民头上。昆明学生响应中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呼声，并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新华日报》的社论指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昆明学生罢课斗争点燃的第一把反内战争民主的怒火，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正如闻一多教授所说，在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心脏。运动声势之大，群众参加面之广，学生斗争的顽强和坚持时间之久，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二·一”运动的胜利和昆明学生英勇而机智的斗争榜样，给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开展反美反蒋斗争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出，“一二·一”运动是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一二·一”运动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更加汹涌澎湃。1946年7月，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杀害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惨案，全国人民愤怒声讨。1946年12月，北平学生为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学生相继响应，各地参加人数总计约50万人，形成抗暴运动。1947年5月，由于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使其政治、经济、教育危机日益加深，教师学生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挣扎在饥饿线上。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的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伙食费，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英勇斗争，不怕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坚持了1个多月，规模宏大，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把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称为“第二条战线”。从“一二·一”运动经历抗暴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从未停止过的学生爱国斗争，在壮大人民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促进新中国诞生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一二·一”运动则是这一系列斗争的开端，对推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二·一”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和“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丰富和发展了青年运动的经验。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社、《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持续地、大量地发表消息、社论和文章，对运动进行鼓励和指导。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自始至终对运动进行了直接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在运动中，省工委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派，特别注意团结教授、教师和争取学校当局的同情支持，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中立地方实力派，结成了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充分发挥学校党组织和民青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骨干作用，领导公开的群众社团和学生会、学联等组织，同群众紧密结合，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党组织紧紧地依靠群众，从群众中吸取智慧，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彻底揭露反动派的屠杀

暴行和政治欺骗、分化阴谋，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广泛地向前发展。在运动过程中的各个关键时刻，处理斗争的重大问题时所提的战斗口号，谈判条件和采取的斗争方式，都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因势利导，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高超艺术，使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始终保持紧密团结，坚持斗争。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一二·一”运动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

“一二·一”运动教育和锻炼了千百万青年学生和教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造就了大批干部。运动中，昆明直接卷入的大中学生、教授教师，共达3万多人。除极少数持对立态度的人外，其他人无不在斗争中受到熏陶，受到教育，受到洗礼，得到锻炼。中共党员、民青成员和其他许多进步学生，是运动中的骨干。他们始终战斗在最前列，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殉难4烈士中，就有于再、潘琰两人是中共党员。斗争中受重伤而失去左腿的缪祥烈也是中共党员和民青盟员。其他被国民党暴徒殴打致伤的学生，多数是民青盟员和进步青年。他们在斗争中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还学到了如何团结队伍，做群众工作，做统战工作，以及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等才干。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学生，大都是有为的爱国青年。他们中不少人原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爱国学生的屠杀，终于使他们看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真实面目。他们当中许多人由于受到血的斗争的洗礼，逐渐由糊涂走向清醒，由萎靡走向振作，由懦弱变为勇敢，由动摇变成坚定。许多人从独善其身的小天地里走出来，从同情同学的正义行动进而投身于革命烈火中，积极参加战斗，从此走上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运动不仅教育了新一代青年学生，也教育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当时云集昆明各大学的教授，许多是国内著名学者。他们很多曾留学欧美，有较高的学术造诣(yì)，也有较浓厚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但多数人有强烈的正义感，痛恨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和特务的横行无忌。惨案发生后，他们看到自己的学生遭屠杀，同事被殴辱，正当的集会自由被禁止，学府的尊严被践踏，无不表示极大的愤慨。于是从发表诗文抒发悲愤，到公开声明提出抗议，直至采取罢教停教行动支援学生。在“一二·一”运动中，教师是学生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运动最直接的同盟军。特别是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等教授，自始至终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与学生同战斗，共命运，同悲欢，共荣辱。他们在课堂上和反内战争民主的战场上，都是学生最敬爱的老师。

“一二·一”运动广泛深入的斗争，使革命队伍空前壮大。斗争中涌现出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他们在运动结束后，大量被吸收加入民青，民青的骨干大多数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运动前，昆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仅20余人，复课后增加到100余人，民青盟员由30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1946年春夏间，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南方局的指示，向南方局输送了一批党员和民青骨干，分配到四川、武汉、上海、东北、华北等地工作。同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迁回北平、天津，中法大学也迁回北平。原来这些学校的进步骨干和积极分子，大部分随校北迁。他们在平津地区的学生运动中，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二·一”运动为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城市，主要是昆明，青年学生高举“一二·一”的旗帜，在抗议国民党当局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抗暴斗争，

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以及在助学运动、人权保障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一系列斗争中，发扬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捍卫了昆明“民主堡垒”的荣誉。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号召在蒋管区开展游击战争，云南省工委有计划地把经过爱国民主运动锻炼的革命师生，成批地输送到全省农村。截止1949年9月，输送到农村的革命青年达万人。他们为云南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